

一、史学是什么？

1. 质疑与批评

说来奇怪，还没有哪一门学科的研究，会像历史学那样，存在着那么多的分歧、质疑和批评。这些分歧、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学能提供怎样的知识产品，是单称判断，还是普遍性命题？它所提供的知识是否确实可靠？是否有客观性？第二，即使它提供的知识确实可靠，即使它获得的知识具有客观性，那么，它们有什么用——历史知识有什么用？任何一门学科以及它的研究者，如果在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上遭到他人的怀疑或否定，就等于是怀疑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不过，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并不太在意这些疑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或理所当然的事情。自从分析历史哲学兴起之后，前辈学者的乐观主义和称心如意才彻底地被搅乱，这两个问题不仅变得严峻，而且难以回答、难以回避。今天，每一位从事这一行当的研究者都会碰到这一类疑问：当历史学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一大堆历史事实时，门外汉向历史学家所提的唯一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马尔奎斯·杜·查特理特曾对历史知识感到困惑，她说：

一大堆混乱的无联系的事实，一千个关于不带任何决定性的战争的叙述。一个和我一样的法国妇女有什么必要知道在瑞典埃格利继承了哈奎恩和奥托曼是奥托古尔的儿子？而这一类历史知识，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还不断地在与时俱增。在今天，

转引自恩斯特·布莱萨赫：《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

马尔奎斯还可以进一步质问：为什么她要操心关于 17 世纪英国妇女生育率的一大堆资料？为什么她要关心现代美国炼钢工人以及诸如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的家具、法国军队新兵中的痛风病的发病率等历史问题和知识？而这些问题，以及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知识在专业的历史著作中比比皆是。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是让历史学者犯难的问题，即便是终身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历史学家，恐怕对此也未必能说出个究竟来。或者如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那样，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①。我们可以无视门外汉的质疑，说那是出于对历史学的无知和误解；我们也可以说卡尔·贝克尔在发一时之感叹，是对世人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所表示的一种愤慨（的确，贝克尔并非真的认为历史无用）。但是，这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如果你越是深入去思考、越是对历史学有过一番真切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你越是会陷入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抑或它只是一种艺术。这些在其他学科里不会有的问题，或者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历史学中却充满了疑问与分歧。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在哲学上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本质和能力，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就好像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那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深受康德影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将康德的这一观念变为他反思史学的宗旨：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对自己的了解，那么，他对历史的了解总是不完备的。他说：

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判与洗练。

另一位学者曾经这么说：一门学科成熟的程度，取决于它对自己的成果的自觉程度，决定于该门学科用以达到并证明真理的方法的理解程度^②。由此可见，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不仅要致力于认识自己的对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 汤因比等著 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99 页。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34、41 页。

孔阶平：《认识论与自然科学》，《东岳论丛》1980 年第 2 期。

象，而且还要从事于认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虽然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学科，但它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常常不能自觉地去反思自己的研究活动，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性质常常未能有真切的了解。

半个世纪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谈论“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很担心“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提得多余”^②甚至被认为是“最让人吃力不讨好”的问题^③。当时，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研究在有些国家（如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被视为一种概念的游戏，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故弄玄虚。职业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问题，而且会增加许多思想上的混乱。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卡尔的担心似乎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的中国学术界，对史学自身的讨论和研究仍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历史研究者很少，也很不习惯，甚至很不情愿去反思自己的研究活动，反思乃至批判自己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理论、方法和概念的合理性，因为任何反思都足以干扰他们的工作、扰乱他们的平静和自信。

何兆武先生说：如果说以往的历史理论家大多不够重视史实，那么同样可以说，以往的实际历史学家就更加忽视自己的理论思维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必要，这一点或许是古老的历史学到了近代落后于其他学科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何兆武：《苇草集》，三联书店，1999年，第173页。

卡尔著，吴存柱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③ 1972—1973年间，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以“什么是历史？”为题作了一次演讲，讲演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讲本课程的中心部分，可能是最让人吃力不讨好的部分，有时候也是技术要求最高的部分。”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第95页。

参见何兆武：《苇草集》，第156页。

雷蒙·阿隆曾谈到过史学家与哲学家在有关历史哲学问题上的无法沟通。他认为，只有少数史学家会非常认真地对待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而大多数的史学家还未能全部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他们没能意识到重建历史所带来的问题。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第29~30页。就笔者所见的材料来看，这种缺乏反思态度的现象，似乎并非中国史学界特有的现象。陈新的译作《当代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收入了理查德·汪的《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一文，其中说到历史哲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国都不甚被注意的情况，原文如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相当程度上甚至到今天，几乎在任何地方，历史哲学都是一个学术孤儿。在荷兰，它被当作指导历史学研究的常规部分讲授；在美国，大多数历史学系将这门学科限制在历史方法论导论性质的研讨班内，将它委托给一位愿意分担研究生新生指导重任的在职教授来主持（极少数例外，他们有人对这门学科有着特殊兴趣）；在英国，历史学的研究生通常自由选择专业，一些人蹒跚地进入历史哲学专业，但是，当他们依旧对专业中任何形式的反思无动于衷时，（像大部分历史学家一样）照样不会受罚。

其实，讨论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并非是为历史学争得一个科学的头衔和称号，而是借助对这一题目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明白历史学大概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因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历史学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才能明白历史学者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期待历史学什么，不能期望它什么。

2. 历史学的科学化

在西方学术史上，历史学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未被人们视为科学。在古希腊时期，科学是一种求得“真知”的学问，历史知识不属于“真知”，历史学也就不属于科学。这样的划分，并不是古典时代的人们有意要贬低历史学的作用和价值，相反，史学与“诗”并立，由缪斯女神之一克丽奥女神司职，地位崇高，职能神圣^②。古典时代的史学家，看重的是史学的艺术性功能：它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智慧、提供道德评判的依据。那时，历史学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因为历史学不能提供“真知”而烦恼。

古典时代结束以后，历史学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史学成为神学的一个分支，它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在世俗世界的历史里论证宗教神学的合理性，为其作佐证和诠释。如果那时有科学的话，那么，承当这种责任和使命的研究学科，都是最重要的、无可怀疑的科学，史学的地位不仅崇高，而且神圣。

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科学才有了特定的含义，并成为一切学问的成功典范。见贤思齐，历史学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的期望

雷蒙·阿隆曾说：“我在当时和现在一直在用康德的三个问题来表述这一思考：Was kann ich wissen? Was soll ich tun? Was darf ich hoffen?”（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有权期望什么？）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第16页。

^② 美国历史哲学家 A·斯特恩认为：“对希腊人来说，历史编纂学是对各种事实的估价，是一种对被认为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光荣的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预先假定一个价值的概念，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各种价值的等级序列。希腊的历史学家们有意识地使用了这个等级序列。……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不可辩驳地与价值的领域连结起来，正因为如此，它常常被责备不公平和缺乏科学的普遍性，因为价值的判断是主观的和多变的。……对希腊人来说，这种境遇无论如何是不应受到指摘的。反之，挂满桂冠而且分配光荣与谴责的克丽奥在他们的眼中在履行着一种庄严的职能。”（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338~339页）

和追求——向自然科学看齐，以便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于是，历史学开始了学科史上的科学化历程。

历史学的第一次科学化的努力，起始于 18 世纪，其实践者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有维科、康德、赫尔德、黑格尔，以及 20 世纪最后两位思辨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家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富有哲理、充满睿智。读他们的著作，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爱和对人类前途的忧患之情，这正是历史学的根本精神和史学家的根本责任。

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试图在历史世界里发现一种规律——一种牛顿式的规律，历史学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那么，它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科学的行列。然而，这种努力及其实践在 19 世纪就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批判，特别是思辨历史哲学家们常常为了自己心爱的理论而不惜以“普罗克拉斯提斯”的方式来处理史实，这就违背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②。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有一段批评说得极好，他说：

近代最好的历史学家都偏离了真理，不是由于想象的诱惑，而是由于理智的诱惑。他们在从事实归纳一般原理方面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先辈。但不幸的是，他们犯了歪曲事实以迎合普遍原理的错误。他们通过观察现象的某个方面达成理

^① 劳伦斯·斯通在《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一文中，对“科学化的历史”有不同的分类归纳，他认为，“科学化的历史”，首先是由兰克较有系统地提出，这种看法认为，对于埋藏在各国档案中的迄未发表的记载，加以精详地考据研究，将可确立永远不必修改的政治史实。自兰克以后，又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科学化历史”，即马克思的经济解释模式、法国的生态—人口学模式和美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式。法国的生态—人口学模式，可以法国史学家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为代表，他的名言就是：“凡是不能量化的历史是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的。”计量经济学家则宣称：只有他们这类的特殊量化方法，才够资格称得上是科学的。（劳伦斯·斯通著，古伟瀛译：《历史叙述的复兴 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历史理论与批评》[台北第 2 期，第 23~24 页]）。

克罗齐著，付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230 页。卡西勒说：“他们构造出一种历史的逻辑思想，试图把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伸展到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上。”（卡西勒：《历史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 595 页）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常使被劫者卧其床上，比床长者砍其长出部分，比床短的则与床拉齐。

论；其他方面则通过夸张或割裂事实以适应理论。

这样的批判无疑在昭示后人，以这样一种努力来证明历史学的科学性只能是“此路不通”。1961年，汤因比的皇皇巨著、12卷本的《历史研究》最终出齐，这是思辨历史哲学研究的最后一座高峰，此后，这一研究暂时告一段落。

18世纪被称为哲学的世纪，19世纪则是史学的世纪。当历史车轮进入史学世纪时，新一轮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又开始了，其实践者就是19世纪执西方史学牛耳的客观主义史学，大名鼎鼎的兰克学派可以看作是这一实践的代表^③。兰克学派的口号是“如实地说明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整个19世纪的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卡尔·贝克尔曾这样说：

十九世纪常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时代，同时也被称为历史的时代。这两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从1814年到1914年这以往的一百年中，人们进行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大量研究，研究伸展到了历史的每一个方面——研究是细致的、带批判性的、详尽的（甚至使人精疲力尽）。我们的图书馆塞满了大量的这样积累起来的关于过去的知识。

虽然历史学家仍不断地埋头于挖掘事实，热衷于这种无尽而绵密的研究，而圈外人士却失去了耐心，并产生了新的疑惑：普通人抱怨历史学家所发现的历史事实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可供发现的事实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看

麦考莱：《论历史》，《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270页。

通常我们都认为汤因比是思辨历史哲学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历史研究》是思辨历史哲学的最后丰碑。然而，自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弗兰西斯·福山著，本书翻译组译：《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问世，笔者对于思辨历史哲学是否真的已经结束产生了怀疑。我们不必接受福山所说“历史终结论”，但是，福山所思考的“人类普遍史”，正是思辨历史哲学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只要历史延续，“人类的普遍史”总是史学的永恒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仍将继续。

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里说：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兰克虽然重视史实的求真，但他在本质上仍是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继承人，也不排斥历史哲学，他本人的思想非常复杂，将“客观主义史学”与兰克和兰克学派等同起来，是兰克的史学考证方法和思想传到德国以外，被人局部理解的产物，但这一片面理解恰好反映了19世纪史学界向自然科学学习，追求“客观化”的趋势。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7页。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98页。

不出这桩或那桩事实的发现与否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哲学家则认为，只要历史学家抱住单纯的事实不放，它就不是科学^①。虽然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史学遗产，但他们这一番努力的结果，只是在比较平凡的意义达到了科学性，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相去甚远。

3. 彻底的批判与反思

正当兰克学派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酝酿一种对历史学的全新研究——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的批判与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和兰克学派的史学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求“同”的努力既然失败，那么，思考的路向应当移到“异”的一面。于是，理论研究的路数为之一变：由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转变到关心和研究史学自身的问题，有关历史学的本性特质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热点。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144 页。

历史学可以在这一层面上达到科学性，这是许多学者都同意的一种看法。比如，罗素就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里所肯定的历史学的科学性，就是一种比较平凡意义上的科学性。罗素曾说：当人们把历史作为科学来谈论时，也许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意思。从一种比较平凡的意思上说，科学只是指弄清历史事实；另一种是指“自然科学已成功地发现了各种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意义上说”的科学，即历史学用同一种方法去发现联结各种事实的因果律。参见罗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 年，第 63~65 页。

有关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时间，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理解，提出这一名称的沃尔什认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也有学者（如路易斯·O·明克）认为它的兴起当以 1938 年为标志，因为此年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的问题》相继问世。何兆武、陈启能先生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一书中，把其兴起的时间定在 1874 年英国学者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的发表。庞卓恒先生认为，如果将狄尔泰、文德尔班及克罗齐等人视为“批判分析历史哲学”的最初表达，那么其兴起的时间可以划在 20 世纪初。（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第 350 页）笔者认为，如果划分得更仔细一些，那么，1874 年《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的问世可以看作是起点的标志，而其兴起则在 19 世纪的末期，因为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学者的有关著作都发表于这段时间（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序论》发表于 1883 年，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出版于 1892 年，《历史与自然科学》出版于 1894 年，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出版于 1899 年）。20 世纪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如克罗齐、柯林武德、雷蒙·阿隆、沃尔什、威廉·德雷、卡尔·亨佩尔、海登·怀特等，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显学”时期。

狄尔泰的哲学理念是生命哲学，他以此归纳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两大差异：其一，历史是人的精神生命，而自然界谈不上这一点；其二，对精神生命的研究，只能是内在的体验，而自然科学是因果的解释。文德尔班的研究路向也侧重在“异”的一方，但与狄尔泰稍有不同。他以价值哲学为基点来展开他的历史个别论，认为历史不同于自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个别性与价值性，其不可重复性，反映了个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由此提出学科分类的原则是它们的认识目标的形式性质：有些学科研究一般的规律，有些学科研究特殊的事实。前者的目标是普遍的定然判断，后者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前者所考察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是现实事件的一次性的、特定的内容；前者是规律科学，后者是事件科学；前者是制定法则的，后者是描述特征的。李凯尔特更把价值问题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划分标志。他说：只有借助于价值的观点，才能从文化事件和自然的研究方法方面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别开。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把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标志为与价值联系的方法，反之，自然科学是一种对规律的或普遍概念的联系进行的研究，它不研究文化价值，也不研究它的对象和文化价值的关系^②。李凯尔特有一段话说得颇为风趣：

自然科学只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现成的衣服，因为这套衣服并不是按照这两个人的体形裁的。如果自然科学‘按照每个人的体形’进行工作，那它就必须对自己所研究的每个对象构成新的概念，但这是与自然科学的本质相违背的。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5~56页。文德尔班强调历史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他甚至认为，人的活动如果是重复性的，那么他就不在历史领域之内了。韩震在他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里，对文德尔班的这一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实质上是取消了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这一批评似乎有所误解。文氏所谓的在历史领域之外，并非是指历史停止或历史的完结，而是说历史没有了创新。因为历史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创新，唯有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新东西才体现出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如果历史的延伸或更替只是次次重复的刻板文章，那么它就既无任何创新，又无价值可言。套用文德尔班的逻辑，社会的再生产，只能是历史的重复和延伸。这一思想与黑格尔的历史终极观相似。近年翻译出版的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历史终结论”，也不是说历史到此完结，而是说历史虽然还在不断延续，但已无新的内容可言。

李凯尔特著，徐纪亮译：《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77页。

（文化科学）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衣服，也就是说，它们想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

三位学者的论述虽有差异，但其主要观点却是一致的，即历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完全不同，它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观点称之为“史学特殊论”，那么，这种观点无异于向学术界宣告：前人的种种历史学科学化努力全属枉然，历史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在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有关对这几位学者及其观点的批判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开创了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先河，并为以后近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规定了范围。20世纪以后，这一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界的显学，后继者有柯林武德、克罗齐、沃尔什、波普尔等等。从表面上看，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研究大多由哲学家们所从事，他们的研究极其抽象，与史学实践相隔甚远，对史学家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长远地考察，在促使和推进历史学由18—19世纪的“规律史学”、“史实史学”逐渐转向20世纪的“理解史学”的过程中，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理论研究功不可没^②。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学术著作和观点，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他们那些“蛮横极端”的名言，如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成了校园学子的“口头禅”。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只要你踏入这个“研究领地”，就无法回避或绕过他们给我们留下的种种难题。

4. “史学概论”概论什么？

说起对史学的反思研究，中国古代有两部足以引以自豪的史学理论著作，即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史学史的角度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42、50页。

王加丰先生认为，20世纪的新史学的总体特征是“理解”。这一特征，既可以体现在史学的功能上，也可以体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上，由此，或可以概括为“理解史学”，以与以前的“规律史学”、“史实史学”相区别。参见王加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来看，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两部理论性的史学著述。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两部著述大体还局限于对史学编撰方法、史书体例的批评，而不是对史学本性特质的思考，虽然它也可以归入史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但其主要所关心的乃是历史编撰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对史学本性特质的真正反思性研究，属于 20 世纪“新史学”的范畴。1902 年梁启超倡议“史学革命”这一番史学观念的新思考、新定位，为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拉开了序幕。在 20 世纪最初的四十年间，有为数众多的史学概论、史学通论性的著述相继问世，表明了对史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已经引起中国众多史学家的兴趣和关注^②。史学概论或称史学通论，其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历史学是怎样一门学科。翻阅当年出版的这些史学概论性的著作，令人吃惊的是，不管是哪家哪派，比起后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更像“史学概论”。如 1924 年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所写的《史学要论》，主要论述的问题有：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他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与人生态度的影响。该书中的一些章节和论述，直接对应着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理论，是对李氏理论的研讨和批判。1939 年出版的、当时被用作大学教材的杨鸿烈的《史学通论》，专设一章讨论“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

从历史编撰的形式进而讨论历史学科的性质，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路数。

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这一类著述主要有曹佐熙《史学通论》（1909 年）、徐敬修《史学常识》（1923 年）、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 年）、刘剑横《历史学 ABC》（1929 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 年）、吴贯因《史之梯》（1930 年）、罗元鲲《史学概要》（1931 年）、赵吟秋《史学通论》（1931 年）、周容《史学通论》（1933 年）、李则纲《史学通论》（1935 年）、胡哲敷《史学概论》（1935 年）、杨鸿烈《史学通论》（1939 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 年）、蒋祖怡《史学纂要》（1944 年）、付振伦《中国史学概论》（1944 年）、柳治徵《国史要义》（1948 年）等。此外，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 年）、李季谷《历史之理论与实际》（1935 年）、林楚《怎样研究历史》（1943 年）、姜蕴刚《历史艺术论》（1944 年）、吕思勉《历史研究法》（1945 年）、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1945 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46 年）、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1947 年）、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1948 年）、刘节《历史论》（1948 年）等，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还有一些译作，如黎东方译法国史学家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3 年）、余楠秋、谢德风译英国史学家司各脱的《史学概论》（1933 年）、周谦冲译意大利史学家沙耳非米尼的《史学家与科学家》（1945 年）等。有关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见赵世瑜：《20 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4 期）和邹兆辰、江涓、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第四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年。

定”。作者先从科学的广义、狭义和最狭义的定义入手，从“材料”和“方法”两个方面，对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西方历史哲学家的著作及其观点，在当时这类概论性的著述中都有介绍和评述。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是“苏版”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取代了概论性的研究，“史学概论”的课程被取消了，这一类著述也销声匿迹。这种取代，并非完全来自于行政命令，而是在其背后有一种观念理论上的支持，即认为只要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科学，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早已解决，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学会和使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①。这种观念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②。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史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及其运用，而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某些论断反而被我们忽视了，比如马克思有关社会学科研究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的论述^③，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随意粘贴的标签”的论述以及有关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论述，都极为深刻而精彩，却没有引起我

最能代表这一观念的是胡绳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指明：“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更早的还有潘梓年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变成科学》（《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1期）一文，其思路和论证逻辑与胡文大体相同。

^②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新世纪初年，已经出版的各种类型的以“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和方法”为书名的著作，在论述“历史学如何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时，大多仍然沿用了这种观点，甚至论证的逻辑也完全一样，由此可见，这一观点的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此时出版了各种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书名虽冠以“论历史科学”，但其内容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阐述和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此类著述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研究历史》（人民出版社，1974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75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参见姜义华：《历史认识论的可贵起步》，《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马克思曾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页）这里虽然以政治经济学为例，但事实上反映了社会学科研究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差异。

们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被人遗忘许久的‘史学概论’的研究重新被提上了日程。或者是因为学术脉络被中断以后一时不易衔接，或许是因为近 30 年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一时难以冲破，80 年代初最先问世的一本《历史科学概论》（1983 年版），虽然把它概论的任务规定在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但其具体所展开的内容，仍然是一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演示，当然也增加了史料学、中外史学史及国外史学方法的述评等内容。“复苏”后的史学界一时对“史学概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竟然茫无头绪——没有了研讨的方向。白寿彝先生是较早体会到唯物史观不能代替史学理论的学者之一，他在回忆早年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摸索时说：

在 50 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

于是，针对这种情况，史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有关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及其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1983 年，姜义华先生发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提出：“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或穷尽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工作。”^③次年，宁可先生发表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④一文，明确提出：我们要研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 页。

有关这场讨论中的部分代表性论文，后来结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历史科学的反思》，由中州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有关的分歧和讨论，可参见张耕华：《近年来史学概论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综述》，《历史教学问题》1987 年第 5 期。

姜义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研究》，《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宁可：《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究的对象是“史学的理论”，而非“历史的理论”，两者不能替代和混淆。这一场讨论并没有能解决“‘史学概论’概论什么”的问题，但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成或穷尽历史学，我们有必要对历史学本身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这两个观念逐渐为史学界的同仁所接受，并最终形成一种共识。这样，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迷茫而无方向的时代才宣告结束。

5. “历史认识论”的兴起

史学概论的“大讨论”所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学者们只是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史学自身的理论研究。从当年参与讨论和发表的论文来看，大多数学者不赞成把史学概论弄成“拼盘”的模式，强调它应该有自己特定的内容体系和逻辑结构。但是，究竟是“史学概论”不是“拼盘”还是史学理论不是“拼盘”？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要概论的是“史学”而不是“历史”，但是究竟是作一番史学研究范例的演示，还是对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反思？这些问题，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解决，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不仅其内容仍然采取“拼盘”模式，而且其所拼入的“菜肴”还越来越多^①。这或许说明了史学概论作为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从教学的实际要求出发，需要向学生介绍有关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内容，反映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即这种“拼盘”方式的史学概论颇能符合教学上的需要。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史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它的内容体系应该是针对这一特殊问题而展开的，而不能是相关学科内容的“拼盘”。所以，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理论研究逐渐由史学概论转入到历史认识论，而史学概论则继续存在，但它更多地只是作为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一门课程而存在，并继续有学者进行研讨。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眼光敏锐的学者已经感觉到对史学本身的研究不能取消，姜义华先生曾提出历史认识论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

① 如由贾东海、郭卿友主编的《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教材，不仅采取“拼盘”模式，而且其所拼入的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了史学原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理论史以及二战以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与特征等内容。

与历史本体论、历史方法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该单独进行研究。然而，当时许多学者对“历史认识论”这一观念能否成立都表示怀疑^①。学理上的客观要求由于没有客观环境的配合，一直迟迟不能付诸实践，直到“文革”之后的反思年代，对史学本身的反思性研究才提上了日程。

真正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来考察历史研究活动，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姜义华和曹伯言先生几乎同时尝试了一种新的“史学概论”研究模式，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设计学科的内容体系和逻辑结构。刘泽华、张国刚诸先生的一系列“历史认识论”的论文，则向学术界演示了一种从一般认识论角度和方法来考察历史认识活动的研究模式。这一些初步的尝试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最终引起了史学理论研究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出，当初的这一转向最终导致了一种类似西方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研究路数，不过，当时的学者们对这一趋向并不十分清楚，比如，刘泽华等先生在 1986—1989 年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历史认识论的专题论文，对历史认识活动及其过程的研究可谓深入细致，但始终没有涉及到对历史学本质特性的思考。1984 年出版的《历史科学的反思》一书，汇集了“史学概论”大讨论中各种不同意见的论文，其中收入陈广乾先生的《什么是史学理论》一文，该文分 6 个部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概况作了全面的介绍，分别为：一、历史是什么，二、过去是真实的存在吗，三、什么是历史陈述的客观性，四、什么是历史解释，五、怎样理解历史

参见姜义华：《历史认识论的可贵起步》。

从学术编年史的角度来看，从一般认识论的层面来研究历史认识活动，较早的是姜义华和曹伯言先生。姜义华先生的《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一文，刊于《复旦学报》1985 年第 1 期，后来收入由葛懋春、项观奇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中，他的最初设想后来也部分体现在 1989 年出版的《史学导论》（该书由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等合著，现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 2003 年 8 月修订出版）一书中。曹伯言先生的研究，反映在由吴泽华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的前言中，也是以认识论的理论讨论史学问题，并按认识论的理论体系来设计“史学概论”的体系框架，虽然这一设计在该书的内容部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曹伯言先生的有关研究，还可以参考以下论文：曹伯言：《“史学概论”三题》（《学术月刊》1987 年第 6 期）、江波：《略论“史学概论”的逻辑结构》（《历史教学问题》1985 年第 3 期）、曹伯言、张耕华：《试论史学概论之对象》（《学术界》1985 年第 5 期）等。

有关的论文可参见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 年第 5 期）、刘泽华、张国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 年第 12 期）、刘泽华、叶振华：《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文史哲》1989 年第 1 期）。

中的因果关系，六、怎样理解历史中的价值判断。如此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同行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论题、论域、分歧、症结等情况，这在国内学术界还是第一次，可惜当时并没有引起史学理论界的重视。而在此之前已经翻译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和《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两书中的许多论文，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也没有引起史学理论界，尤其是史学概论研究者的普遍注意。

1987年9月，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大会议题是“历史认识论”。陈启能先生的大会发言，对该次讨论会所反映出来的“有些论文和发言不甚切题，讨论的‘论域’不够确定，对历史认识以及一般认识论缺乏一致的共同理解，对国外研究历史认识的情况缺少了解”等问题提出了批评^②。同年陈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论历史事实》一文，向国内同行系统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概况以及国外同行的研究兴趣和热点^③。论文新颖而含义深刻——历史事实是历史知识的组成“细胞”，是构建历史大厦的基石，但是“历史事实”这一范畴的含义在近100年来的演化变革的深度，只有19—20世纪之交自然科学中的“物质”范畴的命运可以比拟。西方及苏联、东欧的历史哲学研究，都是以“历史事实”作为讨论研究的切入点来展开对史学的本质分析。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以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围绕着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历史认识活动的特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专题论文^④。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认识论专题研究，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文杰等：《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参见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101~107页。

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另可参阅陈光前：《关于历史事实的概念》，《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巴尔格著，莫润先、陈桂荣译：《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这一研究领域的有关论文、论著，可参见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第四章《历史认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的介绍。与此同时，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展开了“社会认识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地位和价值。唯有从这时开始，才出现了一系列真正研究史学本身的理论论文。至此，距离西方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发展大约已有近 100 年了，距离 20 世纪初中国第一次史学理论研讨高潮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6. 何、庞之分歧

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一旦起步，进展甚速。一系列的专题研究，水到渠成地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最能代表当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动向的是何兆武与庞卓恒先生的有关论文及其争论。

1996 年，何兆武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①一文，阐述了他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何先生把历史学分为历史学 I 与历史学 II 两个层面，他认为：

历史学 I 是科学 历史学 II 则是哲学。

什么是历史学 I 和历史学 II 呢？何先生认为：历史学 I 就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历史学 II 则是对历史学 I 的理解或诠释。他说：

历史学 II 包括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没有科学性就没有学术纪律可言，它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但是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成其为历史学。

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待于历史学 II 给它以生命。

次年，庞卓恒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对何兆武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商榷。庞先生认为，科学一词，虽然尚有不同的界定，但其基本含义已渐趋一致，“那就是把科学视为从特殊现象求出一般规律（尽管什么是一般规律，理解上还有很大歧异）的学问或知识

^①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3 期。

体系”。因此，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历史学 I 而是体现在它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上。1998 年，何先生又发表了《历史学两重性片论》^②一文，这是作者为《西方近代思潮史》一书所写的序言，着重论述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人文成分，尤其是人文成分中的非积累的部分，如人们的价值观、道德取向和人生境界等，以及历史学对这一类非积累性的人文成分在理解评说上的困难。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自己早先论述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上述讨论的继续。1999 年 庞卓恒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一书出版，在书中的最后一章，作者针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选择了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或是否能够运用“普遍规律”对历史作出解释、历史认识或历史解释是否具有客观性、科学主义与人本文主义等问题一一作了深入的探讨，也可以看作是上述讨论的深入。对于这场讨论，笔者在 1999 年发表了《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 II 的普遍性》^③一文，对何、庞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及其症结、难点作了一番整理和澄清。

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们似乎又回到了 20 世纪初的起点。2002 年 1 月，邓京力女士在对何兆武先生的采访中，再次提及这一场讨论并询问何先生是否对庞先生的观点再作回答，何先生说：“我觉得庞先生的观点和我的没有矛盾，他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历史没有规律，而是说这个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同的。历史学如果是科学的话，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④对于何、庞两先生来说，这一场讨论似乎已经结束了。不过，对于中国史学理论界而言，真正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何、庞两先生的讨论及其分歧，几乎涉及到这一领域里所有的重要问题——这也是西方历史哲学家一直关心、研究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以此为起点，延续何、庞两先生的讨论及其涉及的问题，正好能帮助我们这一领域的研究和问题作一番全面而彻底的清理。

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② 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张耕华：《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 II 的普遍性》，《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1 期。

何兆武、邓京力：《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何兆武先生访谈》，《历史教学问题》2002 年第 3 期。